

從中、日甲午戰爭 看我國當前海軍與國防建設(下)

著者／陳孟豪

海軍官校71年班，現主持「孟樵翻譯，研究工作室」

伍、結論（含建言）

中日兩國之間的海上、陸上戰爭自西元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起雙方軍艦於豐島海面發生第一次遭遇戰起，至翌年（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澎湖失守止，戰爭一共持續了八個月。日軍於朝鮮、遼東及山東半島方面的作戰，一共動用了五個師團（總計約七萬餘人），作戰及疾病死亡人數達一萬七千餘人，海軍艦艇僅松島、比叻、赤城、西京丸四艦受創較重，但未曾損失一艘（海軍官兵死者一一五人、傷者六十四人）。

清軍則北洋艦隊全遭殲滅，旅順各要塞砲臺及威海衛南、北岸各要塞砲臺各砲（各式輕重砲計四百門以上）盡落日軍手中，陸軍參戰官兵總計超過八萬餘人，惟逐次投入戰鬥，且多新募之兵，指揮作戰的能將寥寥可數，傷亡雖無官方正確統計數字，合理估計應至參戰總兵力的半數即四萬餘人，戰場遺棄之野戰砲超過三百門、機關砲超過一百五十門、步槍超過三萬枝、各種砲彈（含各砲臺砲彈）超過三百萬枚、步槍彈藥超過五千餘萬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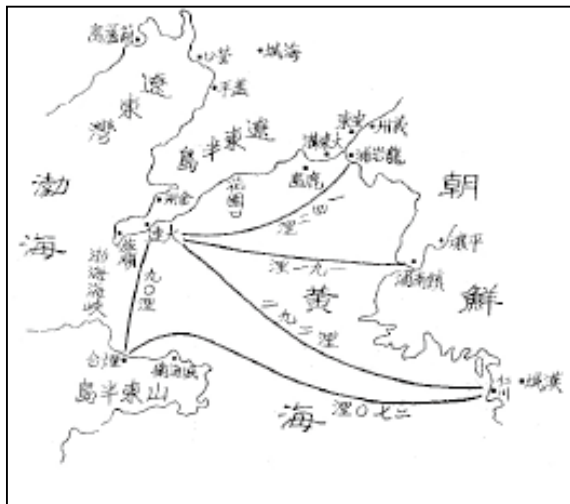
馬關條約簽署後，日軍對台灣進行武力接收，台灣方面以新募之兵、糧餉械彈不足、無指揮作戰之能將、倉促應戰，卻能與日軍的正規部隊相持達五個月之久（此不含各地義軍此起彼落的四處武裝抵抗，直至一九〇二年鳳山嶺林少貓部被殲滅為止，臺灣人的武裝抵抗才算完全停止），日軍動用了將近三個師團近四萬人的兵力掃蕩全臺，卻傷亡近五千人，傷病官兵達二萬七千餘人，病死者無算。此全憑臺灣人民的一股正氣，壯烈犧牲，前仆後繼，不難想像當時戰況的慘

烈，日軍的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亦因戰傷不治而死於臺南。日人初期治臺亦無法鞏固，迭換總督，一八九六年六月樺山資紀為桂太郎取代，同年十月又易為乃木希典，一八九八年二月再易為兒玉源太郎。

總結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清軍的致敗原因有以下幾項：

一、以落伍的陸戰戰術思想與軍事訓練對抗新式的陸戰戰術思想與軍事訓練

日本軍官皆由陸、海軍官學校培養出來，高級將領及重要參謀則畢業自陸、海軍大學，具有充分的現代軍事知識、完整的戰術與戰略教育。相形之下，清軍的將領及幹部則大多是打長毛（太平天國軍）、捻匪、馬賊出身，間有武舉出身的中級幹部，惟所考科目不外舞刀、馳馬、射箭，對於現代火器出現以後的新戰術一無



旅順與威海衛形勢圖

所知。李鴻章在小站訓練的新軍，顯然並未接受符合現代化戰爭的軍事訓練，其新軍在戰爭中仍沿用密集隊形去抵擋日軍的槍砲火力。

二、清廷沒有一個完善的戰爭計畫，對於日軍的作戰動向全無正確判斷，陸戰方面犯了逐次用兵的大忌，新募之兵既訓練不足，指揮作戰的將才更資質庸劣，且戰場上各路人馬雜陳互不統屬、也不相救，情報蒐集亦不夠重視，因而處於被動、挨打的不利作戰態勢。

一八九四年，日軍假朝鮮東學黨之亂悄悄增兵朝鮮之仁川、漢城，入據朝鮮王宮逐退舊人而由親日派掌要職，並改組朝鮮政府使仿效日本制度。在戰爭計畫方面，六月二日成立大本營於東京，海軍於七月中旬將全數艦隊編成聯合艦隊秘密進駐朝鮮西方海面，大本營的初期作戰計畫是希望以朝鮮日軍作為牽制部隊，以吸引清軍至朝鮮，主力部隊則趁虛而入，進襲直隸平原展開決戰，迫使清廷屈服。

清廷方面則不明敵情，不清楚部隊能否打仗，一味看不起日本，也根本沒有一個戰爭計畫，更不重視情報蒐集與研判，開戰之前即先機盡失，而互戰爭全期完全沒有掌握戰況，處處被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因敵制敵，扭轉戰場劣勢。

此外，相較於日本的徵兵制（士兵平均年齡保持在二十三、二十四歲間，年輕力壯，富於冒險犯難精神，除建立常備的正規部隊，並廣儲第一、第二、國民兵等預備役兵力以應戰時兵源之需，作為戰時徵召的補充兵年齡至多達二十七歲以內，且每年定期召集複訓。至甲午戰爭前夕，日本陸軍已有七個師團共十二萬三千四百餘人的現役兵力），清軍採用募兵制，軍隊的來源因討伐太平天國、捻匪、回亂、馬賊等而招募團練（民團）轉變而來，充滿地方色彩。並且，久未作戰，官兵老弱而暮氣沉沉（部隊中老官兵佔大多數，體力



英法特拉法加之役海戰圖

上難以勝任現代戰爭的艱苦環境），腐敗墮落且缺額甚多，而開戰直前臨時招募的百數十營新兵則屬烏合之眾。更不用說沒有設置培訓現代化陸、海軍軍官的軍官學校、研討戰術與戰略教育的陸、海軍大學以及其他的相關軍事教育訓練單位等。

從戰術面的兵力集中原則來看，既然日軍已在漢城集結大軍，清軍即無據守牙山（成歡）地區的必要性，應即迅速撤退，將兵力向平壤城集中，可增強平壤的打擊兵力（從一萬四千餘人增至一萬七千餘人以對抗日軍的二萬人）。此外，朝廷應嚴令各軍嚴明軍紀，不得擾民，並命葉至超從本身做起，堅守平壤，加強敵情偵蒐，部隊絕不後退，任何人敢擅自退卻者問斬不饒，則平壤之戰鬥不致於在一天內即陷落。

當平壤戰事進行之際，清軍主將宋慶即應爭取時間加強鴨綠江之佈防，做好戰鬥準備，並加強敵情搜索。平壤戰鬥結束後，當日軍接近鴨綠江時，已是十月間的秋末冬初時節，道路不佳而天雨均影響日軍的部隊運動，設若清軍能充分利用地形之利，掌握日軍動向，則在日軍渡江之前、部隊前進運動、兵力未及集結完成之



日俄戰爭之203高地雙方爭奪戰

際，應有甚多良機可進行先期之游擊襲擾作戰，打擊其先頭部隊或吃掉其小兵力部隊等。不應在鴨綠江北岸等候敵人完成渡河來攻，應該以騎兵主動出擊（利用夜暗襲擾），發揮積極的作戰精神，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甚至是打擊其半渡之際，先挫敵威，並為爾後之作戰奠定基礎。

如果清軍主將宋慶能守住鴨綠江一線，予日軍第一軍以重擊，則日軍爾後可能改變作戰計畫不敢貿然登陸第二軍於遼東半島南方以攻取旅順、大連。此外，如果北洋艦隊能取守勢，據守威海衛，避免與日本艦隊貿然決戰，則日本艦隊投鼠忌器，未必敢於運送第二軍貿然登陸遼東半島以攻取旅順、大連，則旅、大未必會陷落。

在牙山（成歡）、平壤、鴨綠江、遼東方面、旅順、威海衛等戰場，清軍陸軍未見有計畫完善、謀定後動的積極主動的攻擊，也少有重視戰場情報蒐集的作為，大部份的戰鬥都是等著敵人前來，且大多是一接戰不久即潰退，更不用說部隊指揮官多貪生怕死的庸劣之輩，沒有一個戰場有統一的指揮統帥，且各路人馬不相

統屬、不聽指揮、不相支援。

平壤失守後，山東方面的駐軍（甲午戰爭前兵力達五十營約二萬五千人）大部份調往遼東支援作戰，致使後來日軍第二軍（含第二、第六等二個師團約三萬人兵力）登陸山東半島來犯時，留在威海衛的守備兵力少得可憐（僅十餘營約五千人弱）。而李鴻章及督辦軍務的恭親王奕訢，從未好好掌握敵情情報，認真判斷敵軍的次一行動，兵力的調動沒有顧及全盤的戰略，也沒有隨時相應的作戰計畫，更完全忽略了山東的防務，坐令北洋艦隊受困威海衛而遭殲滅。

三、北洋艦隊不應輕易與日軍進行主力決戰，宜採守勢，堅守威海衛、旅順一線，伺機而動，避實擊虛，機動出擊，擊滅勢孤力單之敵。

自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起，清艦未再增一艦而日艦則逐年添購新艦，且新艦在艦速、艦砲數量及射速方面均優於清艦，「在甲午戰爭前夕，日本海軍已擁有新式艦艇二十一艘，其中九艘於一八八九年以後下水之英、德製最新型快速巡洋艦，配備數十門十吋左右

速射砲」¹。既然戰力不足，沒有與日本艦隊打一場大決戰的勝算，即應採取守勢，保持艦隊實力，自然能夠發揮屏障京畿門戶的重要功能，依托港防要塞砲之防護，令日軍投鼠忌器。

然後，北洋艦隊動員渤海灣沿岸人民百姓及漁民們，借重民力，廣佈情報耳目，一旦發現日艦進窺渤海灣各沿海地區之蹤跡，立即循行政管轄體系儘速回報至北洋艦隊，使北洋艦隊能充分掌握日軍聯合艦隊之一舉一動，防範日艦之偷襲、悄悄運兵轉戰遼東戰場或山東戰場、甚至直取京畿。只要能掌握日軍艦隊進出渤海灣、黃海之動態，即適時出動艦隊，選擇最佳時機攻擊敵艦，避實擊虛，以擊破日艦運兵作戰企圖為主要目的，絕不戀戰，並伺機擊滅勢孤力單之敵，採取海上游擊戰法，以多吃少，令日艦不勝其煩，無所遁形，進退失據，投鼠忌器，自然不敢輕舉妄動，進窺京畿要地。

雖然李鴻章曾上奏朝廷力主北洋艦隊取守勢，駐防於威海衛伺機而動，讓日艦投鼠忌器不敢貿然逼近渤海灣（威海衛旁之煙臺與旅順旁之大連相距僅九十海浬為最近點）。然朝廷中多位不負責任的大員如翁同龢等交相指摘彈劾，皆斥海軍膽怯，清廷遂責令丁汝昌率艦隊出海巡弋（清光緒皇帝年輕氣盛而思慮不周，不能冷靜衡量敵我實力，輕信朝臣謗言，輕率下令艦隊出戰，其本人實難辭其咎），終難免與日聯合艦隊相遇於大東溝附近海域而爆發大戰。

清艦實際參戰軍艦有十艘鐵甲艦，總排水量為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噸，各艦航速在十一至十八節間，主力火炮及速射砲總計七十九門。日艦參戰艦艇為十二艘，總排水量達四萬零八百七十一噸，各艦航速在十三至二十三節間，主力火炮及速射砲計二百四十六門。如以艦隊運動時最慢艦艇速率為艦隊之速率而言，雙方艦速的優劣差距並不太大，然以雙方艦上火砲的數量比較即可看出日艦火力的猛烈了。

黃海（大東溝）海戰之後，清艦隊雖損失了五艘艦艇（含主力艦經遠、巡洋艦致遠、超勇、揚威及廣東水師之廣甲艦），仍有主力艦定遠、鎮遠、來遠、巡洋艦靖遠、濟遠、平遠、廣東水師之廣乙、廣丙等八艘大型鐵甲艦，以及十二艘百噸以內艦艇、十二艘魚雷艇等，艦隊實力仍在，再取守勢足可防守威海衛，令日艦

不敢輕易來犯，自然亦不敢輕易進入渤海灣，進逼京師門戶。

真正令北洋艦隊遭到全數殲滅惡運的是威海衛南、北兩岸的砲臺悉數陷落，日軍以砲臺之砲及海軍艦砲、魚雷艇聯合夾擊，方使北洋艦隊遭到殲滅。

設若威海衛的陸軍守備兵力保持原有的五十營約二萬五千人強的兵力，（在甲午戰爭之前，威海衛之陸上駐軍及山東省境的駐軍等原有步兵五十營、騎兵八營、水師二營，皆配備有相當數量的野戰砲兵，可用於支援威海衛的作戰。）此外，如能再予增強兵力，加強敵情搜索，將戰鬥力較強的部隊貼近威海衛部署（最佳的部署應是能夠機動出擊，重視情報偵蒐，掌握並趁日軍登陸部隊立足未穩之際，迅速予以致命的打擊），使要塞砲臺無後顧之憂，則日軍未必敢強行登陸山東半島攻略威海衛。

海軍北洋艦隊是防守北京的最重要一道海上長城，而其艦隊的存活完全依賴威海衛的南、北兩岸要塞砲臺各砲，至於要塞砲臺的屏障則仰賴於一支堅強戰力的陸軍守備打擊部隊。艦隊、要塞砲臺、要港守備機動打擊部隊三者實命運共同體，缺一不可，此為建立北洋艦隊時應有之完善規劃，調動山東部隊支援遼東方面作戰，使威海衛防務空虛，致令日本陸軍登陸山東半島攻佔威海衛各砲臺，北洋艦隊在威海衛各砲臺及日本海軍艦砲、魚雷艇聯合夾擊下遭到殲滅，故而山東駐軍之調走即註定了北洋艦隊覆滅的命運。

四、清軍對於情報作戰之重視程度不足。

一九一四年八至十二月間橫跨大西洋（Atlantic）與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的英、德之間無線電情報監聽作戰，為第一次大戰中雙方情報戰的高潮。英軍的大艦隊（Grand Fleet）與德軍的公海艦隊（High Seas Fleet）彼此於出海活動時，皆想盡辦法做到無線電靜止（wireless silence），以防敵人的無線電情報竊聽，並竭盡所能地設法打聽對方的一切動態情報。此外，歷史學者們多認為一次大戰中德軍在東戰場的坦能堡（Tannenberg）會戰之所以贏得勝利，是因為截收當時俄軍第一軍團與第二軍團於無線電洩漏了翌日攻勢中彼此位置所致，事實上，德軍自己的無線電洩密情況也沒有好太多，主要的原因是雙方都缺乏訓練有素

的密碼電報人員。由此可見，從當時敵我雙方情報戰的焦點多注重於截聽對方的無線電資訊，即可瞭解當時交戰雙方對於情報之重視。

日本方面早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日本人愛國企業家岸田吟香不惜投入鉅資，在日本少壯軍人荒尾精之精心策畫、協助下，悄悄至中國上海透過設立樂善堂（以販賣美國人赫本博士所贈之獨創配方眼藥水「精錡水」（Seikisui）為招牌，並經常向中國百姓免費發放藥品以博取慈善之名，實際上豢養了大批年輕日諜人士，以商養諜）、日清貿易研究所（由樂善堂於上海成立的間諜學校，全力培訓商戰和兵戰的兩棲諜報人員）等機構，積極在中國廣佈間諜網，以興亞主義號召大量日本青年投入對中國之間諜活動，喬裝成中國百姓，深入中國內地（含兩湖、四川、陝、甘、雲、貴、新疆、西藏等地）調查地形氣候、風土人情、產業交通、關卡、兵營、軍事要塞等。當甲午戰爭爆發後，多數樂善堂、日清貿易研究所培訓之日諜納入軍隊系統，對日軍爾後在華之情報偵察、斥候、進軍路線、探查清軍駐軍動態、北洋艦隊出港情資等，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宗方小太郎探查北洋艦隊主力即將奔赴朝鮮、調查威海衛港內北洋艦隊之軍艦數量、調查中國適合登陸各海口的水文資料（按：二次大戰初期日本聯合艦隊於偷襲珍珠港之前數月，亦同樣派遣日諜悄悄偵察美軍太平洋艦隊之在港軍艦數量、珍珠港水文資料等，顯示日軍運用日諜之一貫性）、日本外務省用計破譯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與清政府間之外交密電、向野堅一探知各路清軍向金州集中兵力的情報等影響清軍敗績之重要情報資料²。

縱觀清軍之作戰，初期既知日軍之增兵漢城、海軍聯合艦一部進駐仁川、釜山，即應開始進行戰爭準備，全般判斷日本之戰略與意圖，妥擬作戰因應方案，及早部署兵力。特別是，應即時指示牙山的清軍撤離，向平壤城集結，增強防務，加強敵情搜索。

平壤戰事爆發後，應即密令宋慶加強鴨綠江北岸的防務部署，做好戰鬥準備、加強敵情之偵查與搜索，佔取先機，伺機主動出擊，於敵人先頭部隊逼近鴨綠江時，即以騎兵進行夜暗襲擾敵人，讓日軍於渡江前即飽受襲擾之苦，打日軍一個措手不及，殲滅小股部隊，力

挫敵威，奠定爾後作戰的勝利基礎。

此外，應嚴令北洋艦隊固守威海衛-旅順一線，加強要港之要塞防務，加強陸軍之機動打擊部隊的戰力與整備。

凡此一切作為皆須環環相扣，既要有全般性的戰略指導，並應即時掌握瞬息萬變的戰場情報，各級將領並須勇往直前、遵行命令、身先士卒、節制部隊。最重要者，戰場上必須號令嚴明，統一行動，軍紀嚴峻。

然而，清軍自始至終，前線部隊完全不重視敵情之偵搜，毫無積極主動的作為，無法完全掌握前線的戰況，清廷對於戰爭之和、戰慌了手腳，全無腹案。此外，兵力的調動完全沒有全般的戰略概念，也沒有充分掌握敵情狀況，處處被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因敵制敵，扭轉戰場劣勢。總之，李鴻章及督辦軍務的恭親王奕訢，從未好好掌握敵情情報，認真判斷敵軍的次一行動，兵力的調動沒有顧及全盤的戰略，也沒有隨時相應的作戰計畫，更完全忽略了山東的防務，終使北洋艦隊受困威海衛而遭殲滅，京畿防衛門戶大開，不得不接受日本苛刻的城下之盟。

五、清廷權貴貪腐，斷送海軍購置新艦之建軍發展契機³。

歷史學家唐德剛指出：據李蓮英的接班人小德張（滿清王朝最後一任總管太監）的回憶，「慈禧太后於甲午戰爭前後一天的生活費大致是紋銀四萬兩」。如折成實物，即宮廷半月費用可購滿一艘吉野級巡洋艦，兩月之費可購買一艘超級主力艦，一年之費則可至少裝備一支傲視全球六、七位的海軍艦隊。在當時上下交征利的情況下，建頤和園、建軍祝壽、利用海軍衙門肥缺中飽私囊等等權貴貪腐不堪情事，斷送了北洋艦隊必須不斷添購新艦以保持現代化戰力的建軍發展。

甲午戰爭有沒有可能打勝、對當前的國防建設與海軍建軍有何經驗教訓？

日軍於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之陸上戰鬥兩次奪佔旅順軍港，兩場戰爭中日軍皆進行陸上戰鬥奪佔敵人艦隊要港，達到全殲敵人艦隊的最後作戰目標。

第一次是中、日間的黃海海戰結束後（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於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軍於

一天內即自清軍手中奪下旅順軍港，清軍完全沒有堅強抵抗（其後，日軍攻擊威海衛亦僅耗時十四天即攻佔）。

第二次是日、俄海軍艦隊於對馬海峽海戰結束後（一九〇五年五月），於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一九〇五年一月二日，日、俄兩軍戰鬥的勝負關鍵在於爭奪可俯瞰旅順港的二〇三高地，奪下二〇三高地之後則旅順港內的俄艦盡在日軍的砲火威脅之下，兩軍均付出慘重之傷亡代價（截至俄軍投降而戰爭結束、旅順陷落為止，日軍傷亡近六萬人、俄軍約三萬人），日軍以源源不絕的後繼兵力實施近於人海戰術的攻擊，終於贏得慘痛勝利。由此，可以看出日軍對於攻佔海軍要港以達成完殲滅敵方艦隊的積極企圖。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軍在週密的計畫與隱密艦隊運動下，成功偷襲珍珠港，得勝後卻未積極進佔珍珠港，使美軍喪失最接近遠東地區之艦隊重要基地，應是初期作戰計畫中即未曾將登陸與攻佔珍珠港列入於作戰計畫內。

半年後，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至六日的中途島之役，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將希望攻佔中途島，卻因無線電情報傳遞遭美軍截獲並破譯，且美軍情報靈活，而空中偵察技術超越日軍（美軍已能運用雷達技術掌握敵艦，並引導戰機攻擊敵人艦隊，日軍則尚無雷達技術，其戰機一旦自航艦起飛赴中途島攻擊時，指揮官即無法掌握最新的敵情狀況，做出最佳的因應），因而使美軍能正確判斷並完全掌握日軍欲攻佔中途島的意圖，而能先敵進入戰場，以逸待勞，使日軍艦隊遭致慘敗。

中途島之役中，美軍之戰場指揮官尼米茲上將坐鎮於珍珠港卻能充分掌握敵情狀況，實際上的海上戰鬥是由指揮官史伯魯安茲少將率領三艘航艦，對抗日軍南雲中將的第一航艦艦隊的四艘航艦。美軍航艦雖居數量劣勢，但在航艦之戰機數量方面則與日軍相當（各為二五〇架）。惟如日軍能將另外二艘（輕型）航艦加入攻擊中途島之作戰，則戰機數量將可較美軍多出近一百架。（中途島海戰爆發前，日軍的攻擊部隊中總共有六艘航艦的戰力，其中二艘輕型航艦用於攻佔阿留申方面的作戰，南雲中將麾下只有四艘航艦可用，山本大將如能將當時的全部航艦撥歸南雲指揮，集中用於

中途島方面的作戰，則中途島之役的結果可能會不一樣）。

中、日之間的甲午戰爭既然不能避免，則開戰之前，李鴻章應儘早向光緒皇帝稟明其整體戰略腹案，對日軍之作戰意圖進行冷靜而客觀的判斷，並積極動員備戰，落實作戰部署，包括成立類似日軍大本營之參謀本部，積極研擬作戰計畫，加強對日情報之蒐集與研判，提早整訓部隊與選將。清軍之陸軍中不乏能將與勇將，如聶士成、左寶貴、馬玉崑、豐興阿、依克唐阿、長順及宋慶等人，關鍵在軍紀嚴明、號令一致、賞罰分明、毋枉毋縱、知人善任、慎選主帥。如李鴻章能儘早加強陸軍之整備與訓練，全程督戰，嚴密掌握作戰軍情，不容謊報作假，自然可以充分瞭解及遴選最佳的主帥，部隊的戰力自然提高，陸上戰鬥的結果也會大不相同。

黃海（大東溝）海戰明顯證明北洋艦隊不適合出戰，開戰之前艦隊各管帶（艦長）早已清楚艦隊戰力與日軍聯合艦隊相去懸殊，李鴻章也力主保船不出戰政策，卻因光緒皇帝在眾朝臣不負責任的交相彈劾下，不得已而令艦隊出海，任令劣勢的艦隊離開要港砲臺的屏障。惟即便是居於劣勢下，大部份艦隊官兵均能奮勇出擊，殺身成仁，視死如歸。

從雙方接戰的艦隊編隊上看，清艦之雙翼雁行陣勢不若日艦的單縱隊，加以日艦於海上運動靈活，優於清艦的運動遲緩，然而清艦鐵甲厚實尚可抵消日艦火力的優勢。真正造成當日海戰敗績的關鍵因素是清艦的艦砲火力相對太弱（清艦的主力火砲及速射砲總計七十九門，對抗日艦的主力火砲及速射砲總計二百四十六門），而最後導致北洋艦隊全數殲滅的原因不是海戰敗績，而是陸戰失敗，要港及各要塞砲臺盡落日軍手中，遭日軍轉用於轟擊北洋艦隊而遭殲滅。

黃海海戰一役中，北洋艦隊因戰力不足以抗衡日本的聯合艦隊，實不宜出戰，日軍聯合艦隊早已準備好，伺機而動，隨時準備與北洋艦隊打一場海上決戰，一舉殲滅北洋艦隊。

此與英、法海軍艦隊於特拉法加發生的戰役不同，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午起，英、法海軍艦隊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海上大決戰，英國海軍納爾遜上將（Admiral Horatio Nelson）率領三十四艘軍艦與法西

聯合艦隊的三十三艘軍艦爆發一場大海戰，雙方實力在伯仲之間（英艦火炮總數為二四一八門，法西聯合艦隊的火炮總數為二六二六門，較諸英艦多出二〇八門艦砲）。

由於英軍平時即注重勤訓精練，納爾遜並要求各艦艦長在作戰中須能獨立作戰、發揮果敢的精神，且英艦機動靈活。相形之下，法西聯合艦隊的指揮官維爾納夫上將不是一位堅毅果敢的指揮官，對海戰沒有必勝的信念，也沒有什麼謀略，不能沉著應戰，指揮調度遲緩，加上法西聯合艦隊各艦靈活性不如英艦，各艦艦長沒有積極果敢的作戰精神。因此，雙方戰鬥至下午三時許勝敗即已分出，法西聯合艦隊遭擊沉十九艘、俘虜四艘、只有十艘逃回、官兵死亡達七千餘人、指揮官維爾納夫遭俘。英國艦隊的指揮官納爾遜上將則遭法艦砲彈擊傷不治，英國艦隊的損失未及法西聯合艦隊的三分之一，英國從此稱霸海上達一個世紀。

如果北洋艦隊能嚴守不出戰的立場，緊守威海衛-旅順一線的海防門戶，且山東駐軍能不調往遼東戰場，則日軍聯合艦隊必不敢輕舉妄動（不敢進入渤海灣探查清軍的防務虛實），也根本不可能運送其第二軍的作戰部隊登陸遼東半島攻取旅順、大連，並於爾後再由聯合艦隊轉運第二軍至山東半島而攻取威海衛等要港及要塞砲臺。

豐島海戰實可避免發生（即使勢不可免，清艦如能派出四艘大型鐵甲艦護航運送陸軍，則一旦與日艦發生海上遭遇戰，則能以四對三的數量優勢打一場初期小勝仗或平手，此與當時的情報蒐研密切相關），既然清軍已知悉日軍在漢城集結萬以上的兵力，守牙山（成歡）的清軍兵力已然相對單薄，應即著令葉至超部儘速向平壤撤退以集中兵力，如是則海軍無需向牙山方面護航增援兵力，豐島海戰即可避免，北洋艦隊戰力不致受損半分戰力。

對於平壤的增援應循陸路進行，並悄悄而迅速行軍，通過鴨綠江儘速向平壤增援兵力。如此，則當日軍第一軍來攻平壤時，平壤城中應可集結至與日軍相當人數的二萬人兵力與之相抗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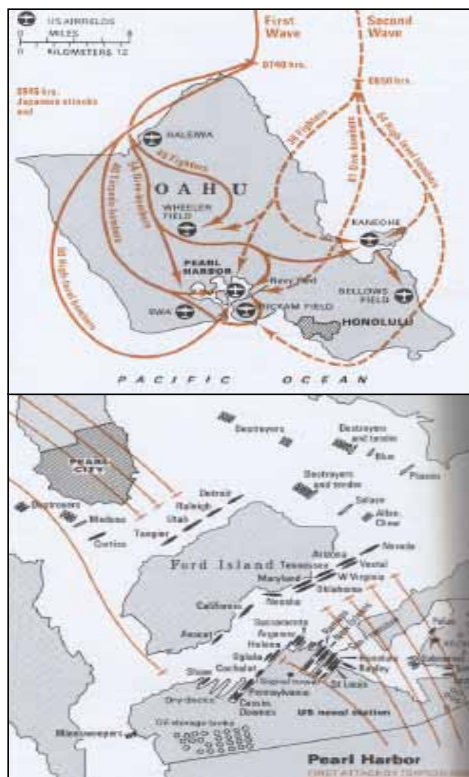
平壤、鴨綠江方面的作戰，應以遲滯敵人的前進為主，清軍既然訓練不足，各級幹部沒有現代化的戰術

思想與訓練，戰鬥力不如日軍的現代化部隊，武器裝備也不齊全，至少熟悉地形，佔有地利之便，邊打邊學習與成長。因此，清軍應自七月起，在平壤、鴨綠江等地區與敵人周旋，打游擊戰、利用有利地形及夜暗襲擾日軍，但避免與日軍作正面的大規模接觸，保全實力，繼續增兵（應可集結至七、八萬人之眾以對敵形成兵力優勢），邊打邊後退，並伺機利用優越的遼東地區有利的天候與地形營造打一場口袋陷阱的作戰，重創日軍（應可營造一場如七七抗戰中之長沙會戰的口袋陷阱，施予日軍以重挫，甚至一舉盡殲日軍第一軍之二、三萬人，重重打擊日軍的士氣）。

只要能夠拖住日軍三個月至翌年的嚴寒一、二月，即可利用冬季的天候因素困住日軍之進兵，清軍亦可有充分的時間集結優勢兵力應戰。大雪有利於清軍作戰（尤其是依克唐阿部的黑龍江軍與長順部的吉林軍都擅長於冬季作戰），且日軍禦寒裝備不足，士兵不耐嚴寒（一、二月間的遼東地區氣溫可達攝氏零下三十餘度），互遼東地區戰鬥期間，日軍患凍瘡者已達四千人餘（冬季天候因素實可好好運用，以消耗日軍之戰力），如戰鬥持續下去則日軍的兵力消耗將十分可觀。

一八一二年五月至翌年一月，拿破崙親率六十萬大軍征俄，俄國沙皇堅持抗戰到底，當時俄軍可用於抵抗拿破崙大軍的兵力全部不過二十多萬人，然而當時拿破崙以為有三十多萬人，俄軍採取「避實擊虛、不斷撤退」的誘敵深入戰術。長途行軍、俄國的嚴寒天候、沒有充分的糧食、士兵又因長途緊急行軍而過度疲勞等因素，使得的拿破崙的大軍在攻下莫斯科時只剩十五萬人餘，惟法軍在莫斯科完全得不到糧食補給（法軍於一八一二年九月十四日進入莫斯科，十五日當天夜裡即四面八方發生火警，風助火勢之下，不久全城即籠罩在一片火海之中），正是「飢餓」與「疲勞」兩大因素耗損了法軍的大部份戰力，軍隊更因糧食短缺與飢餓而四處搶掠致軍紀敗壞，造成俄國人民深惡痛絕的憎恨。

當一八一二年十月十九日，拿破崙下令自莫斯科撤退起，拿破崙的軍隊正處於糧食不足且人困馬乏的悲慘窘境，俄軍也開始進行追擊、襲擾及反攻（初期的遭遇戰、俄軍的指揮不當亦耗損了許多俄軍戰力，因此當



日軍攻擊珍珠港圖及照片

拿破崙下令自莫斯科撤退時，俄軍能夠集結的兵力總數不過剩下六萬人餘）。嚴寒的天氣（天氣最冷時曾達攝氏零下三十餘度，與遼東地區的嚴酷寒冬氣溫相當）繼續耗損法軍戰力，俄軍則久處寒地裝備充足、以逸待勞、居地利之便，加上其哈薩克騎兵行軍快速，砲兵靈活機動，法軍一路慘敗，六十萬大軍最後能逃回巴黎者僅剩八千餘人！

如果李鴻章能夠及時瞭解拿破崙征俄失敗的經驗教訓，並儘早整訓陸軍各部隊，應可好好研擬一套陸戰誘敵深入、避實擊虛、游擊戰、夜戰襲擾、以天候與地利消耗敵軍、營造口袋陷阱殲敵的作戰方略，從平壤至遼東地區進行廣大縱深的防禦作戰，與日軍進行長期消耗戰，中國有的是人，日本自然經不起長期人力的消耗。

此外，堅守北洋艦隊不出戰的立場，著令北洋艦隊嚴守旅順-威海衛之間的海防線，游弋於渤海內外，則

旅順、大連及威海衛未必會陷落。艦隊存在的關鍵因素，在於要港各要塞砲臺的守備防務鞏固，兩者實為唇亡齒寒的密切關係。只要北洋艦隊存在一天，則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必不敢輕舉妄動，無法進入渤海灣，日本陸軍當然也就沒有可能登陸遼東半島及山東半島以攻取旅順、大連、威海衛等要港。

關於日軍聯合艦隊之打擊北洋艦隊、陸軍之攻略遼東及山東等地區，其海、陸用兵並未擴及中國其他沿海、內陸地區，此固與其大本營之初期全般作戰計畫有關，可能另涉英、日間之戰前雙方默契，約束日軍不得侵犯英國在華之經濟利益地區（按：一八四二年之中英南京條約及一八六零年之中英法俄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確立了英國在中國長江流域及以南的經濟利益地區）。

清廷自然應顧慮及日軍可能直攻直隸平原，直取京畿的戰略，適時調集全國各省之兵，拱衛京畿，令日軍不敢輕易來犯直隸。

各種史料都證明，甲午戰爭時期光緒皇帝對李鴻章仍是完全的信任，而李鴻章久處朝廷，也頗獲慈禧太后的信任，還須運用智慧處應朝中顛頂、不負責任的大員如翁同龢等之制肘。李鴻章如能善用朝廷的信任，誠然艱難，積極整頓海、陸軍的軍務與戰訓，而且針對日



日軍攻擊珍珠港前照片

翎官帽及三等第一寶勳勳章。馬吉芬於一八九五年曾在美國紐約出版的「世紀繪圖月刊」發表一篇文章名為《鴨綠江外的海戰》，文中對清、日雙方艦隊的兵力、陣型、戰況描述詳盡，真實描述定遠、鎮遠二艦受到五艘日艦圍攻而巍然不動搖、官兵毫無畏懼奮勇殺敵之情形，引起歐美海軍各界的廣大迴響，以及馬漢的重視），稱許馬吉芬是作為西方文明國家的海軍親臨使用新銳武器進行海戰者之一，在硝煙彈雨中勇敢戰鬥，因此對其深表欽佩。馬漢批判清政府對北洋艦隊限定活動範圍於渤海灣（不得越出山東半島尖端之成山頭至鴨綠江一線）之不當，認為此一禁令不僅束縛了海軍提督丁汝昌的手腳，更剝奪了北洋艦隊在海軍戰略上的主動權，同時違反「最好的防禦就是攻擊」的軍事原則，此與我國兵聖 孫子的「攻則有餘，守則不足」之用兵思想不謀而合。馬漢曾經指出，北洋艦隊於黃海海戰失利後，戰鬥主力猶在，卻退守威海衛軍港而無所作為，將制海權拱手讓予日本聯合艦隊，馬漢認為不可思議。

三、艦隊之各要港附近須佈署適當數量而戰力堅強的地面機動打擊兵力，須能即時應援，保護要港免遭敵人三棲兵力之攻佔。同樣的問題，亦適用於空軍的重要軍用機場的防護，以及地下化機庫的防護。

四、由於時代的進步，武器裝備日新月異，地面機動打擊兵力平時須能構築地下化的防護設施或做到充分的掩蔽、隱密。

五、軍隊作戰必須號令嚴明，軍紀嚴峻，訓練堅實，戰時方可發揮預期戰力。

六、甲午戰爭期間，清軍不重視日軍動向情報之蒐集與研判，不僅開戰直前誤判情勢而坐失先機，互戰爭全程仍未能即時掌握日軍次一行動的動態，適時調整兵力部署及善用天候、地形、人力等優勢以創造有利的作戰態勢，堅毅鏖戰，迴避不利因素、善用有利因素，扭轉戰局，此應為今日國軍首應重視的慘痛教訓。

七、日軍之作戰，幾乎全然依照作戰計畫進行，足見其全盤戰略、戰術指導、戰鬥計畫等各層級的準備工作都能力求落實，連成一氣。關於此，可從日軍後來在日俄戰爭、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全境、製造蘆溝橋事變進佔華北、因應淞滬戰役之上海增兵以壓迫國軍、偷襲珍珠港、向南洋進兵、中途島戰役等諸戰役中可看出端倪。惟日軍的優點也正是其弱點所在，當其軍隊處於敵情不明、進入國軍精巧佈設的長沙會戰之口袋陷阱，或在美軍充分掌握日軍動態下進襲中途島時，立即失所憑依，首尾不能兼顧，戰力無從發揮，慘遭嚴重傷亡或甚至遭到殲滅。此外，山本大將的座機遭美軍擊落，也正是日軍無線電情報傳遞遭美軍截獲並破譯的結果，顯見日軍在二次大戰時期的幾場重大作戰之失利，皆與情報作戰之失敗息息相關。

八、國軍的台海防衛作戰計畫，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各級幹部的努力，已有相當良好的基礎，惟在落實各層級、各軍種之作戰計畫與訓練之外，還須年年檢

討精進，改進缺失，力求走向聯戰化、立體化及自動化的目標，使陸、海、空軍的戰力在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體系下達到完全融合成為一體的境界，讓戰場完全透明，使敵人無所遁形，並能確實做到能夠臨戰隨機應變，因應最壞的戰場作戰環境！

九、面臨當前中共在胡錦濤主政下，積極朝遠洋作戰的海軍建軍路線發展，以期能確保其在亞洲的軍事主導權、保護其海洋領土、捍衛其海上經濟與能源利益，特別是當必須攻擊台灣時能阻止美軍介入，力求能遂行「打（遠距離導彈攻擊）、封（全面對台實施海、空封鎖以阻絕美軍介入）、登（直接對台展開三棲攻擊上陸）戰術」，擊破台灣的海、空軍力量，同步奪取制空、制海及制電磁權，以實現其「新萬船齊發、多維快速上陸」的軍事威脅下，我們應正視以往的歷史教訓，記取經驗，努力建設海軍，加強國軍戰備、整備，方能屏障台海，有效制敵，確保台灣成為區域安全和平的重要基石。 🇨🇵

-
- 1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頁65。
 - 2 雪珥，《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揭密中日戰爭》，臺北：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 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頁50-68。

參考書目

- 1 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第八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
- 2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參）：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ISBN 95-732-3513-7。
- 3 王明皓，《1895，李鴻章》，臺北：寶學社出版股份有限公司，ISBN 957-2072-28-5
- 4 雪珥，《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揭密中日戰爭》，臺北：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ISBN 978-986-6451-22-5
- 5 吳守成編譯，《第二次大戰史秘》，高雄：大眾書局，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字號局版台業0545號
- 6 鈕先鍾，《中國歷史中的決定性會戰》，臺北：麥田出版社，ISBN 957-469-439-9
- 7 黎東方校編、馮作民編著，《西洋全史第十三冊 拿破崙時代》，臺北：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6。
- 8 黎東方校編、馮作民編著，《西洋全史第十八冊 第二次大戰》，臺北：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6。
- 9 北：John Keegan，《INTELLIGENCE IN WAR》，London: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imited，ISBN 0-375-40053-2，2003。
- 11 Paul M.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 A. Lane，1976。
- John MacDonald，《GREAT BATTLEFIELDS OF THE WORLD》，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ISBN 0-02-044464-8，1985。
- 12 Robert H. Ferrell & Richard Natkiel，《ATLAS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Facts On File Limited，ISBN 0-8160-2883-4，1993。
- 13 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1890(online edition)
- 14 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2》，1892(online edition)
- 15 Alfred Thayer Mahan，《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1905(online edition)
- 16 Richard H. Bradford，《That Prodigal Son: Philo McGiffin and the Chinese Navy》，American Neptune July 1978(online edition)
- 17 Richard Harding Davis，《Captain Philo Norton McGiffin》，1846-1916(online edition)
- 18 Lee McGiffin，《Yankee of the Yalu: Philo Norton McGiffin, American Captain in the Chinese Navy, 1885-1895》，New York: Dutton，1968